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者文库

瓷路人生

——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

任世龙 著

 文物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者文库

瓷路人生

——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

任世龙 著



◎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瓷路人生：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 / 任世龙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010-5207-3

I. ①瓷… II. ①任… III. ①瓷窑遗址—研究—浙江
IV. ①K87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07181号

瓷路人生

——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

著 者：任世龙

责任编辑：王 媛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校对：赵 宁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75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5207-3

定 价：280.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2013年1月，在家中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留影

任世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至浙江省博物馆工作，1979年底转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期从事浙江瓷窑址考古工作，曾先后主持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浙江瓷窑址区系类型调查、慈溪上林湖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著作有《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越窑》《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龙泉窑》等。



1982年，在龙泉源口林场元代窑址工地



1998年，与夫人在一起



1999年，龙泉东区发掘20周年，紧水滩工程考古队重返故地



2002年，赴台北故宫博物院演讲

瓷路人生

(自序)

陶器的产生本属于史前文化所普遍发生的现象，瓷器的发明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伟大创造。由于中国古代制陶术的发展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地域关系的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都曾烧造出既具时代风格，各有地方特征，却又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特色传统的瓷业制品。

在浙江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古代瓷业遗存遍及省境各地。从商周时代及其以前原始瓷业的滥觞，到东汉中晚期瓷器发展的成熟；从曹娥江流域两晋青瓷生产的历史高峰，到南朝以降浙江瓷业的滑向低谷；自唐代越窑青瓷兴起并争得与北方邢窑白瓷并驾齐驱，形成中国瓷业“南青北白”的格局，经五代北宋将中国青瓷业推向又一新的历史阶段；此后的龙泉窑业在浙南山区异军突起，历南宋至元代发展成为中国制瓷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青瓷烧造中心，使龙泉窑名播寰宇，誉满全球。浙江古代青瓷生产赓续相继，绵延不断，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打开浙江这一地下历史宝库的坚固大门，为浙江造瓷业争得如此殊荣的，正是为浙江青瓷研究“导乎先路的拓荒者”——陈万里！如果我们把陈万里先生在浙江瓷业废墟的实地踏查、标本采集、整理研究视为中国传统的古瓷研究由“书斋考古”而迈向旷野的转变和开端，那么田野考古调查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陶瓷理化测试分析的结合则是这一新阶段的标志！即便是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古陶瓷学界大体上也可以看作是这一道路和方法的延伸。

1979年初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联合组建的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在浙江省龙泉县东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瓷窑址考古发掘活动。五个发掘小组均由各派遣单位单独组成，具体操作上采取分组作业、各负其责而又相互协作的方式，整个考古工地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园地，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81年底在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确认这一考古发掘活动是“中国考古学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

一大标志。龙泉窑考古发掘与研究，把中国瓷窑址考古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幸运，因为我得以加入这个新型的工程考古队中，并担任了浙江组的负责人。我紧张，我惶恐，因为各组的领队均系我的同门师兄师姐或是老资格的考古工作者，“同台比拼”，怎能不让人感到压力的沉重？然而，彼此间的信息互通，相互支持，频繁交流，于我而言更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一次去上海组工地，在龙泉溪安仁口摆渡过河后不久，我们乘坐的罗马吉普车在拐弯时意外倾翻。在翻车的一瞬间，我的意识中满溢的是清凉的水波，但再睁眼时却只看见头顶的一片蓝天。原来是停泊溪边的一艘木船把车挡回了溪岸，而我们也算是闯过了这生死一关。

记得这一天好像是端午日。我收到尚在学前班的女儿来信，稚嫩得不明结体的笔迹，加上那“一边写信一边流着泪”的语句，让我心头五味杂陈。同样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一天在上海组工地上，见到以前被认作“北宋”产品的一件外壁刻划凸脊莲瓣纹碗，其内底竟印有八思巴文！

1979年6月，浙江组在龙泉县山头窑窑址群发掘结束后，于1979年10月~1980年7月对大白岸窑址群进行了发掘。一次室内整理标本时，在编号为“龙BY24T2⑥”堆积层中发现刻有南宋“淳熙”字样的残片一件（龙BY24T2⑥：14）。检查该层堆积的包含物，其内涵特征与判断为“北宋”的山头窑编号“龙BY13”的遗存完全相同。考古发现又一次冲击了我们原先的“北宋龙泉窑”认识概念。

《山头窑与大白岸》窑址发掘简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是我从事浙江瓷窑址考古研究领域实践的最初成果。处女作的形成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历时年余，数易其稿；并且在提交学会之前还分别寄出数份油印稿，想听取前辈大家们的指点。该文把龙泉窑青瓷概括为“两路”（两大产品系列）、“三类”（厚胎薄釉、薄胎厚釉、厚胎厚釉三种制品类型）、“六期”（六个不同的

考古期别)，明确了龙泉窑存在着文化渊源不同的两个工艺技术系统，从而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单线排序的错误。出乎我意料的是，此文竟能在大会上宣读并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就在会议结束时，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让我回母校北大做一次龙泉窑考古的专题汇报演讲。翌年春，回校后去拜访老师，长谈中苏先生特别告诫：“瓷窑址考古既非硅酸盐，也不同于陶瓷史研究！”老师的殷切期望和语重心长的教诲，一刻未敢忘怀，至今刻骨铭心！

1982年春至1983年夏，龙泉源口林场元代窑址考古发掘。在近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揭露出具有明确打破和叠压关系的窑炉遗迹8座、瓷业作坊遗存7处，把六大堆积层位区分为三个考古期别。从胎釉原料的制备、坯体制作成型、产品烧成到堆积层位的形成，系列遗迹现象和丰富实物资料的获取，尤其是多处“素烧炉”遗迹的完整揭示，是瓷窑址考古发掘的一次成功实践。

源口窑址发掘的结束，标志着紧水滩工程考古队的全面撤离。此前新安海底沉船中“类钩”器物的产地，被陶瓷界权威人士认定为我省金华铁店窑址所出，轰动一时。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杨晨钟同志指派我去实地调查，恰遇我女儿手臂骨折，拟推迟几日出生，并函告当地文物部门，不想被对方以“已经另行组织发掘”的名义婉拒，心中甚是不快。时任考古室主任的牟永抗先生让我改行江山，于是就有了江山县砩河流域瓷窑址考古的专题调查。依据此行调查的结果，把江山港流域自唐至元明时代的瓷业遗存划分出两个窑区，其产品明确区分为青绿釉、淡青釉、灰青釉、青白釉、黑釉和青花瓷六个制品类型，其中灰青釉、青白釉、黑釉三类常常同窑合烧，同层共存。通过产品面貌特征的辨识，发现它们分别与闽、浙、赣三省瓷业存在渊源关系，从而认定地处浙江边陲的江山地界是三省瓷业的历史交汇处。回想起来，江山此行竟成为浙江瓷窑址考古专题调查的开端。

苏秉琦先生在《给青年人的话》中说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走向

成熟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观点的提出是它的标志之一。“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它是把生物界或全人类当作整体，普遍联系的整体；仅仅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才划分出‘区系’，这样才更有利于进行对它们内部的、外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研究”。1985年10月~1986年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与温州、台州地区联合进行的窑址考古调查，即是“考古学文化区分类型”的实践活动。

温州地区的古代瓷业遗存划分成瓯江下游、飞云江上游、飞云江下游和鳌江流域四个窑区，梳理出东瓯窑、龙泉窑、青白瓷和釉上绘彩青瓷四种产品类型。其中的“东瓯窑”和“釉上绘彩青瓷”类型，既呈现为时间上的早晚，又存在着地域分布上的明显重叠；两种产品面貌和风格特征上，则既有明确差异，又似乎可以找到某种先后连接的“中继”因素。温州西山窑址的调查发掘中，五代两宋时期的遗存又可以划分成三个不同阶段的两类特征有异的产品。淡青釉的类型极具本地特色，而另一类青瓷器物则明显与同期的越窑青瓷相近。

对台州地区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五县的调查，可以区分为溪口—涌泉、临海城郊、黄岩沙埠和温岭大唐岭四个窑区，其遗存系列自东汉晚期延及两宋之际，各阶段与温州瓷业遗存的关联比较密切，而黄岩沙埠窑区中则发现越窑、龙泉窑乃至耀州窑系不同产品类型遗存相杂的现象。

实践活动并非主观的精神活动，同时也受其内在规律和外在环境、条件的限制和制约，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段，我通过自身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的总结，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或批判，开始对瓷窑址考古研究的一些高层次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瓷窑址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一文，即是依据龙泉窑考古发掘的实践经验，结合学习苏秉琦《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对俞伟超、严文明两位考古学家关于考古地层学论述的领悟而形成的初创论作。在探索过程中也曾得到牟永抗

先生的关注和支持，并接受了他的诸多见解和意见。该文的主要论点是瓷窑址堆积地层的形成机理及其堆积特性的分析；堆积层位关系的划分及其考古学依据；同一堆积地层中诸遗迹关系的横向分析；历史窑场布局和总体规模的考古学确认。本文写作的总体意义在于确立瓷窑址考古的根本立足点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单位，试图以此作为与传统古瓷研究的特征区别之一。遗憾的是，作为参加中国古陶瓷学会 1986 年西安年会的论文，该文未能如期向大会提交。其后，我将此文交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吴汝祚先生，请他阅览点评，阅后回复：“认真拜读两遍，很好！但是你发表不了！”一语成谶，果然被一家权威性刊物“本刊不收此类文稿”并加盖红色印章给退了回来！一年后吾师严文明先生来杭，问起我的工作和写作情况，我提及此事，他说“就要别人不要的这件稿子吧”。三年以后，该文在《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刊出。20 世纪末北京大学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越窑寺龙口窑址，一位研究生说“那是我们必读的参考书目”。不知确否？

1986 年《湖南考古辑刊》刊出我与牟永抗先生合作的《“官”“哥”简论》一文。本文以中国瓷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条件和历代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根本着眼点，并把制瓷业发展的自身逻辑过程放到封建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抓住至今争议纷纭的“官”“哥”问题及其联结关系，对中国传统的青釉瓷系统的区、系、类型展开讨论，意欲以此作为纵向脉络考察浙江青瓷历史发展的一个纲要。其主要论断是：以越州窑为代表的浙江青瓷诸地域类型，是自成区系的一大瓷业系统，历来以单一瓷石原料为胎，至唐代时瓷器制品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是其制瓷工艺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的结果；唐代出现地方贡瓷的制度，从唐末至五代刻“官”或“新官”款瓷器，直到北宋时代的贡瓷均属地方贡物，北宋“政宣间”出现宫廷直接垄断的“官窑”，唯此类窑场方可称为“官窑”；官窑的出现，导致以烧造艺术陈设用瓷为主的分支系统的产生，龙泉黑胎型青瓷是一种派生现象，而传世所称之为“哥窑”，可能是

适应古玩市场需求的“仿制品”；此三类制品当是有别于日常生活用瓷生产的另类瓷业系统。鉴于“官窑”和“哥窑”均系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而又莫衷一是的历史悬案，所谓“哥窑”则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恼人疙瘩，心中有点不踏实。成稿以后特地呈请吾师宿白先生批阅，经首肯后方才付印。

面对考古学科迅速前进的总体趋势和 80 年代全国文物普查的新形势，浙江瓷窑址考古如何跟上学科发展的时代步伐，由单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而转变为“课题—工作—课题”的逻辑轨道呢？在前些年瓷窑址考古专题调查的经验基础上，我正式提出了“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区系类型调查”课题设想，此后形成的《浙南瓷业遗存的类型初析》正是此项工作的初步总结。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必须以窑场遗址的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为基础，运用考古学特有的方法论和科学手段去获取瓷业遗存的基本工艺工序、生产格局、窑场规模以及经营方式等考古资料，包括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内涵，从中揭示出中国古代瓷业历史演进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自我轨迹”，成为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生动侧面。在论述中提出瓷窑址考古研究单件制品、产品类型、窑场、窑群和窑系的“五级系列概念”。“窑场”是时间与空间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而“产品类型”是联结窑场、窑群、窑系的枢纽，它既是考古研究中最活跃的研究单元，亦是瓷业遗存类型和瓷业生产体系划分的特征性标志。“五级系列”实即瓷窑址考古研究的五大基本内涵，而制品的胎、釉、器物形制、装饰技法和纹样题材、烧成工艺技术、窑炉结构和装烧窑具等，则是瓷业遗存类型的有机组成因素。

上述的几个方面，似乎可以看作是我关于瓷窑址考古的学科性质、任务、目标的总体认识和主要论述，唯供评论和批判。记得我所一位青年同志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任世龙先生的努力至今未能得到瓷学者的普遍关注，为什么？是因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特殊性，或者是考古学理论本身存在缺陷？”

上林湖窑址群形成于唐代，是唐宋时期典型的青瓷窑业产地和精华所在，于 1998 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 1989 年的严重干旱，慈溪市政府拟加高上林湖水库的蓄水量，越窑遗址群面临覆灭之灾。国家文物局获报后，随即邀请考古专家实地考察，并要求浙江省文物局“组织专业文物考古队伍，尽早对上林湖窑址群进行全面勘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奉命组建队伍，于 1990 年春进驻上林湖。

经调查发现库区范围内有窑址 117 处，其遗存可以划分为两个不连续的时段：东汉、三国时期的 7 处归属“先越窑”，南朝以降直至两宋时期的遗存归属“上林窑”，两晋为“空白期”。后段可以划分为六个考古期别，其中的三、四、五期恰好处于越窑瓷业生产的历史鼎盛时期，时间跨度相当于历史上的唐代中、晚期至北宋中期。此一阶段的越窑青瓷可分为精粗两档，釉色有“秘色”与“艾色”之别。以往曾有“秘色窑”之谓者，把它与“越窑”分割开来。上林窑第六期（约当北宋晚期）遗存通常被视为越窑的消亡形态，南宋时已谓“旧越窑已不复见”。离上林湖不远的古银锭湖窑区“低岭头类型遗存”的考古发现，从考古学上找到了“越窑”的后继形态，从而把越窑瓷业的消亡时间推迟到南宋。此类瓷业遗存中，不仅存在精粗之别，而且明确有着文野之分，但是它们却又同窑合烧，乃至“同匣共装”，当下被普遍认同即史称之“余姚窑”。而我则按考古学命名通则，称其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认为它们正是浙东青瓷由东汉以迄两宋时期、青瓷文化发展的三大遗存时序——“越窑体系”。正是基于此次考古发现，我在《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中明确提出：唐宋以来传统的以州、县称名的瓷窑，或是近世陶瓷学界流行的“窑系”一词，就其文化本体而论，应当理解为一种多元一体并具有不同层次结构的开放性系统，其本质意义应是瓷业遗存不同系统形成过程的渊源流变关系，它既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可再行分割的整体。

随后我在《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就浙江瓷业的“遗存形态”“制品类型”和“文化结构”问题做出如下论述：依地理区域划分的瓷业遗存区块，它们所呈现的遗存序列形式并不都始终表现为各自范围以内的纵向连续，而是显示出不同瓷业谱系错综杂处

和相互交叉的复杂联系，在文化内涵和层次结构上展现为阶段性特征变异的互动协变现象。这就给予我们明确启示：瓷窑址考古不能依照传统的习惯，而必须从窑业遗存的形态，即堆积层位关系和制品类型特征的研究出发，严格划分遗存的期别与类型，通过序列对应关系的比较分析去寻求各自的文化谱系，方才能揭示古代瓷业“自我”演进的历史轨迹。“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古代瓷业遗存形态、制品类型和文化结构的理论探讨，表明我国瓷业文化不同系统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以制品类型为联结纽带的时空网络形态，正是丰富多样的制品类型相继相续，或其形态特征的变异，演化成中国陶瓷文化流光溢彩的历史长河。

“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正可谓“登峰顶觉天高，临深溪知地厚”。回眸自顾，留在背后的是深深浅浅、歪歪斜斜的脚印，涌向心头的是甜酸苦辣、百味杂陈的“瓷路人生”！

任世龙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于杭州寓所

目录

考古发现

山头窑与大白岸——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一 / 002

温州地区瓷窑址的考古调查 / 048

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 069

专题研究

△ 审其名实 慎其所谓——“越窑”考古学定位思考 / 082

论“越窑”和“越窑体系” / 089

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 / 106

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 / 118

论龙泉窑的时空框架和文化结构 / 155

龙泉窑的双线生产——再论龙泉青瓷的两大系列 / 162

“官”“哥”简论 / 172

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析 / 184

理论探索

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 / 200

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 / 209

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 / 228

综合研究

中华国宝图典·瓷器概述 / 246

秦汉陶瓷产品的品种和产地 / 253

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 / 270

浙江瓷窑址考古十年论述 / 279

绍兴文化遗产·陶瓷卷绪论 / 294

南宋瓷坛漫步 / 310

龙泉窑考古的历程——《瓷器与浙江》重读有感 / 318

继往开来话越窑——上林湖窑址调查发掘散记 / 333

龙泉窑址考古记行 / 338

编后记 / 343



考古发现
